

媒社區： 以媒介化理論檢視臺灣社區報發展*

黃順星**

摘要

「社區」，自 1990 年代起一直是臺灣社會文化的關鍵字，從社區總體營造、921 重建乃至地方創生，無一不與「社區」息息相關。臺灣的社區媒體曾一度興盛發展，發揮傳遞資訊、凝聚社區認同的功能。但由於無以為繼的政策，加上新媒體的衝擊，都不斷挑戰社區媒體的型態與意義。本文藉由媒介化理論檢視臺灣社區媒體的發展歷程，分析其興衰背後的結構因素，以及社區媒體如何形塑社區此一模糊易變的概念使之具體化，並創造獨特的媒介文化。

關鍵詞：社區報、社區媒體、媒介化、媒介化社區、新聞史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以媒介化理論探索臺灣社區報發展史》（MOST 107-2628-H-128-012-MY2）之部分成果，感謝匿名評審之寶貴建議，以及研究助理莊宏年與謝宜甄在資料蒐集上的協助。

** 黃順星為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舍我研究中心副研究員，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01/20；通過日期：2020/06/14

壹、問題意識與方法

毫不誇張的說，「社區」(community)，是過去近半世紀臺灣社會的關鍵字。就官方政策而言，自 1968 年行政院公布《社區發展工作綱要》開始，便將社區發展列為重要政策並延續至今。1994 年文建會配合總統李登輝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作為施政重點，更掀起臺灣各地、跨部門持續至今的社區風潮。例如：衛生署「社區健康營造」、「福利社區化」，教育部「學習型社區」、內政部營建署「城鄉新風貌」，經濟部「形象商圈」，均以社區為號召，鼓勵民眾參與。近期為因應少子化、產業轉型由國發會推動的「地方創生」，或教育部強調「在地連結、人才培育」所推動的「大學社會責任」，「社區」依舊是實現政策願景的具體場所。

就民間而言，社區在解嚴前後也是重要的抗爭與實踐場所，例如：新竹市水源里抗議李長榮化工、彰化鹿港民眾反對美商杜邦設廠、高雄後勁居民反對設置五輕或高雄美濃反水庫運動，無一不與在地社區密切結合。及至 1999 年 921 地震，為傳遞溝通各種繁複的重建政策，「公私部門均認為社區報不僅可以作為社區住民間聯繫與打氣的管道，也具有凝聚社區居民意識與激發社區自立自主的功能；於是，社區報就在一時之間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謝志誠，2019 年 8 月 25 日) 半世紀來臺灣社會對社區的關注與投入，促成不同形式的社區實踐，媒體也無法自外於這股潮流。但在戒嚴時期媒體管制的結構下，民間人士無法自由申辦報刊媒體，直到 1979 年行政院新聞局提出《輔導社區雜誌發展方案》後，始能以雜誌的型態申辦社區報，高峰期曾同時存在 39 間社區報。¹

媒體領域的社區實踐特色在於，不只受政策制度的影響，也因媒體技術形式而更替。Jankowski (2002) 即根據不同的媒介形式：印刷、電子、網際網路，區分三波社區與媒體研究浪潮，並強調無論媒介形式如何替換，研究者無一例外期待透過該時期的新媒介而使社區重生、重振連結。類似地，臺灣媒體解禁後，政府開放民間申設中小功率廣播電台，著眼點之一在考量廣播電波的發射距離有限，得以促使業者致力於社區廣播；1993 年公布的《有線電視廣播法》將臺灣區分為 51 個經營區，系統經營者必須設置地方頻道以滿足區域內民眾利益及需求。在這些政策法規中，都可以看到政策制訂者意識到因應

不同的媒介特性而促進社區發展。

所謂社區／社群／共同體（community），根據韋伯（Weber, 1968／顧忠華譯，1993，頁73）的定義：「是指社會行動的指向建立在參與者主觀感受到的互相隸屬性上，不論是情感性的或是傳統性的。」社區也就是指自身感受到特殊的人群結合方式，這種穩定一致、具體的歸屬感，是基於直接、面對面的傳播／溝通後而經驗到的。不少社區報的研究都指出社區報與社區連結（community ties）存在著循環性關係：社區連結與社區邊界是讀者群的結果，而讀者群則是社區連結的決定要素（Mersy, 2009）。如此一來，即便是紮根於特定地理區位的社區報，所號召訴諸的地方性（locality）也並非自然而然的，地方性是文化與論述透過媒介所構連（articulation）而成的。

媒介與社會相互構成的論斷，在杜威（Dewey, 2004, p. 4）的思想中早見端倪：「社會不只藉由傳遞、傳播而存在，公允地說，社會存在於傳遞、傳播之中」。既然社會只在於也藉傳播而存在，如此一來也就沒有任何傳播活動是外在於社會的。就此而言，媒介不但建構人們對社區／共同體的概念，同樣也建構被傳統社區新聞視為基礎的接近性與地方性（nearness & locality）。這個過程不只是社區意義的擴大或改變，也是媒介化過程（mediatization process）。儘管在理論內涵與建構上存在許多爭論（Deacon & Stanyer, 2014; Hepp, Hjarvard & Lundby, 2015; Lunt & Livingstone, 2016），但採取媒介化理論取徑者大多承認媒介在建構社會文化事務上的能動性，關切媒介技術的物質特徵及作為中介物的媒介如何影響傳播活動與實踐的型態與結構（Hepp, 2009）。

本文透過媒介化理論的視角反思臺灣社區媒介發展歷程，說明傳播活動（社區報／媒介）如何建構社會實體（社區／共同體），而媒介性質又如何對傳播過程產生脈絡化的影響。在後文中將看到即便被視為面對面、直接互動的村落社區，都是藉由媒介所建構的產物，加之臺灣對社區之重視乃基於發展理論中的現代化想像而來，純然為自外移植、由上而下貫徹政策的產物，由此更顯現社區作為「媒介化社區」（mediatized communities）的特色。「媒介化社區」並非全然虛構之物，而是呼應論者主張媒介化為涉及各個社會互動層面並具有形塑社會實體能力的基本假設與過程。「媒介化社區」意味著透過社區報／媒介經營者基於行政區劃、歷史記憶、文化特性等所預設的社

區範圍，以及所想像的讀者／銷售群，使外來移植的社區概念得以在日常生活的層面「化」為真實的社區。

因此在討論社區此一臺灣當代社會重要的關鍵詞彙時，除了從政策（社區發展、社區總體營造、地方創生）或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社區作為打造國族的手段）的論述層面探討外，媒介的角色自不容忽視。後續即以社區的媒介化過程出發，回顧社區報在臺灣的發展歷程。尤其是臺灣自 1960 年代推動社區發展政策以來，為爭取聯合國的經費補助在臺灣基層發展、建設社區，在後文將看到這種強調自治、由下而上的社區理念，不但不為執政者所重視，對基層民眾而言也是陌生的。適時而起並為官方所支持的社區報，便在傳遞何謂社區、形成社區認同上產生影響。這樣的歷史現象，由於時間久遠已無法以社區居民為對象，透過問卷、訪談等方法檢證社區報／媒介是否對社區認同、社區連結產生正面效應。本文以文獻分析為方法，透過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系統查詢相關政策的詳細內容，並以其他年鑑、統計資料與以社區媒體為主題的碩博士論文為資料來源，還原社區報發展的軌跡。並透過電子資料庫蒐集與社區報、社區雜誌相關的報導，釐清社區媒介與社區發展、認同的互動。

貳、社區／共同體與傳播

托克維爾（A. de Tocqueville）遊歷剛獨立建國的北美十三州時，就對美國旺盛的城鎮生活留下深刻印象。托克維爾發現在美國旺盛的城鎮生活中，報紙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些在地、獨立的報紙能夠讓由市民組成的各種小群體結合並在社團中發聲與表達意見，而不至於被大眾、多數所壓制，換言之，報紙讓志同道合的人組成社團，共營公共生活（Hatcher, 2012, p. 131）。藉由諸如地方社區、自由結社等中介團體所構成的市民社會，成為對抗國家專權的途徑。社區被用以代表企圖克服因資本主義興起所導致人群關係異化的出路，對社區的嚮往也成為烏托邦思想的源頭。

這種特殊的美國歷史經驗，直接反映在美國哲學家杜威身上。杜威（Dewey, 1991）認為理想的民主生活是社區生活，但這個社區必須以溝通為前提，無論是在個人或團體間必須有充足的互動，溝通是公眾參與政治的先決條件。但公眾的力量卻因工業與市場的興盛而逐漸消逝，因而呼籲應該盡力維繫公眾的影響力量，杜威的理論直接影

響同時代的芝加哥學派。1920年代的芝加哥，面對湧入大量不同文化傳統且使用不同語言的移民環境中，各移民團體如何能夠穩定互動而不致產生衝突？在當時，無論是具體的鐵路網，或者訊息傳遞的電報網路都已成形，但是這些傳播媒介卻被大量運用於商品流通、廣告與行銷，瀕臨破碎的初級團體已無法維繫社會互動以及共同體的親密性（蔡博方，2013）。

於是存在於美國生活中的城鎮經驗與報紙，成為學者思考如何利用此一傳統，重新凝聚社區使之成為具有真正共同性的公共空間，也探討報紙如何在這當中發揮倡議、討論及產生社群共識的媒介。Park（1922）在對芝加哥移民報刊的經典研究中，發現移民報刊一方面能夠維繫移民群體的認同，另一方面成為移民融入美國主流文化的主要資訊管道。以移民為對象發行的社區報，代替移民母國文化在整合社會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不但維繫社會秩序，也使移民群體得以存續。這樣的思考延續到戰後，1950年代 Janowitz（1951）持續關注報紙在維持社區整合的關鍵地位，主張對新聞、報紙與社區的關係作更系統性的分析，探究社區報如何連結社區的需求，形成美國新聞學界獨特的社區報研究。

作為新聞的特殊分支，社區新聞（community journalism）將社區居民及其生活的城鎮社區予以聯繫，社區報更以倡議者的身份代表社區公民發聲。社區報成為城鎮社區的公眾論壇，並且作為公民、政府與社會機構間的溝通管道，刺激有效的治理，促成公民參與。社區報的首要責任在於對公民的關注，為居民倡議，社區本身的活力也取決於對社區新聞的接受程度（Culver, 2014, p. 138）。這同時意味著新聞記者實踐的場域就在於社區所在地，社區新聞的記者、編輯、攝影就是公民記者，不但參與居住城鎮的公民生活，更透過報導積極地參與社區（Robinson, 2014, p. 113）。

Tönnies（1963）曾提出社區與社會（*Gemeinschaft/Gesellschaft*; community/society）的經典區分：社區是由緊密而具體的人際關係及集體認同所界定；社會則是基於抽象的個人利益與原子化個人主義的結合。因此傳統上社區新聞被理解為是以地方為基礎的新聞，是服務居住在明確地理空間上的居民，以地方為優先的新聞價值為顯著特色（Lauterer, 2006）。例如早期研究社區新聞的 Janowitz 即主張都市社區（urban community）是同質性高、存在明確界線的地理空間，社區

報因而以鄰近性做為新聞價值。但這種以地理空間為特質的社區新聞定義，在面對 1990 年代後不斷增生的新媒介技術及持續變化的社區人口組成，勢必得擴大做更廣泛的解釋。正如 *community* 一詞的中譯，除了「社區」還可譯為「社群」、「共同體」等不同意涵的概念。社區／共同體如今更多被用於指涉因各種共享價值所聯繫在一起的利益或興趣「社群」，這些價值可以是哲學的、政治的、專業的或休閒娛樂的。

Bailey, Cammaerts, & Carpentier (2007, p. 10) 認為，過往對社區多從地理與族群面向定義，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必須從非地理要素及文化要素兩方面，增補、擴大社區的界定。根據表 1，在非地理要素部分的興趣與實踐社群，係依據是否共享興趣或共同實踐為準，而不拘泥於地理或族群身份的限制。虛擬或線上社群，則在資訊傳播技術 (ICTs) 所帶來的衝擊下出現的新結合形式。Rheingold (1993) 強調在 ICTs 的影響下，過去基於直接互動的社區／社群將日益衰退，代之而起的是以電腦為中介並超越空間的交流模式，即虛擬社區的興起。在文化要素部分，則是基於主體的社群建構層面。就解釋社群而言側重在解讀文本時產生的共同性；意義社群則是強調社群的象徵性建構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社群所以存在是由成員對意義世界產生的一致性。想像的共同體則如 Anderson (1983／吳叡人譯，1999，頁 10) 所言「即便最小的國族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但他們互相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個成員的心中。」從這個角度看，想像共同體不是由外強加於人，是由其成員積極建構並從中取得身份認同。

表 1：社區的類型

傳統社區定義	以非地理要素補充的社區定義	以文化要素補充的社區定義
地理	興趣社群	解釋社群
geography	community of interest	interpretative community
族群	實踐社群	意義社群
ethnic	community of practice	community of meaning
	虛擬或線上社群	想像共同體
	virtual or online community	imagined community

資料來源：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media* (p. 10), by I. G. Bailey, B. Cammaerts, & N. Carpentier, 2007, Berkshire, UK: McGraw Hill.

這些不同的觀點使研究者得以擺脫地理或族群的限制，將社區定義為具有流動性和偶然性的人群組合形式。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文獻主張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可以和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地下媒體（underground media）、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等概念互換（Hess & Waller, 2014, p. 124）。而且在 ICTs 日益普及的現況下，以全球為範圍串連的族群景觀（ethnoscapes）、粉絲文化或跨國社會運動，不但成為論證全球化的經典案例，也促使傳播學者思考媒介之於社會究竟產生何種效應。

參、社區／共同體與媒介化

Appadurai（1995／鄭義愷譯，2009，頁 41）提醒世人，當論及全球村時，要記得媒介所創造的社區／共同體是「無需任何所在的」（no sense of place），我們居住的世界是根莖狀的（rhizome）甚至精神分裂的。因為電子媒體以全新的方式扭轉環境，轉變日常交流活動，成為建構自我的象徵資源。同樣地，Hepp, Berg, & Roitsch（2014）也指出，媒介在建構社區／共同體過程中的角色扮演，始終是傳播研究的根本問題。尤其當許多論者主張如今社會已處於媒介化世界（mediatized worlds）時，媒介如何凝聚共同體的認同與邊界就益發重要。

早在 1970 年代末期 Altheide & Snow 就注意到媒介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而提出媒介邏輯（media logic）的概念，以指陳媒介在傳播資訊過程的特殊形式，並聲稱「今日的所有社會制度都是媒介制度，當有更多的經驗是被媒介邏輯或論述所影響，我們的世界就是媒體。」（Altheide & Snow, 1991；唐士哲，2014a，頁 8）類似地，Thompson（1995, p. 46）以「文化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 culture）描述傳播媒介對日常生活所帶來的衝擊，這可從中介的歷史性（mediated historicity）、中介的世界性（mediated worldliness）與中介的社會性（mediated sociality）等層面觀察到媒介的重要性。

概括而言，長期主導傳播研究的效果與閱聽人研究，主要關切媒介如何在意義傳播過程中發揮作用，媒介僅是特定的技術或外在於社會、文化的變項，已不足以應付當代社會已為媒介滲透瀰漫的事實

(Hjarvard, 2013, p. 3)。行動者不但運用媒介從事傳播與社會行動建構社會實體，同時又藉媒介轉變、修正傳播過程，媒介無法再被視為外在且與文化社會制度相分離的部分。因此，媒介化是高度現代性下的雙重過程 (double-sided)，一方面媒介滋生為獨立的制度而有其專屬邏輯，其他的社會制度必須去適應；另一方面，媒介成為與其他制度整合的部份，這些制度的活動越來越透過互動性與大眾媒介行動 (Lundby, 2009, p. 8)。

Hepp & Krotz (2014) 認為，媒介化理論 (mediatization theory) 存在兩個主要研究途徑：制度論 (institutionalist) 與社會建構論 (social-constructivist)。就制度論而言，媒介不只是技術，也是社會文化實踐的結構條件。媒介一方面外在於社會，以媒介獨具的力量取得準制度的地位；另一方面媒介也是生活世界如家庭、工作場所及其他日常生活實踐的部份。媒介不但為社會文化制度匯流之處，同時提供解釋框架使行動者理解社會，也構成公共討論的共同場所，於是無論制度之內或制度彼此間的互動都日益地包含更多媒介要素。Hjarvard (2014, p. 126) 認為這種特性是媒介化的二元性 (duality)，亦即媒介不但透過制度脈絡介入社會互動中，同時制度化的媒介也成為半自主的社會實體。在 Giddens (1984) 的結構化理論中，制度是資源與規則的集合，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管制著媒介與社會制度的互動，另一方面媒介本身控制著象徵資源而能夠生產流通媒介內容，又回頭影響其他社會制度與媒介的互動模式，媒介化因而是透過其他社會制度中媒介邏輯的制度化所引致的變遷過程。

但如論者 (Couldry, 2014；唐士哲, 2014b) 所批評，真實社會世界中是否存在著單一的媒介邏輯？媒介所產生的影響是否由其他場域、制度所導致？是否過於媒介中心論而忽略其他如市場、國家的影響？Krotz (2009) 將媒介化理解為長時段的歷史過程，是自傳播活動出現後即存在的現象，與 Hjarvard 將媒介化限定在 20 世紀結束之際始發生的現象有極大差異 (Lundby, 2014, p. 15)。Krotz (2014) 認為媒介化是與個體化、全球化等概念相仿的「後設過程」 (meta-process)。「後設」 (meta) 非指超越一般現象或理論之上的意義，而是指涉基本的過程與實踐 (Lundby, 2014, p. 24; Hepp, 2009, p. 140)，媒介化因而得以與全球化等現象相提並論。Hepp (2009) 進而以媒介的型塑力 (moulding forces) 描述媒介建構社會文化的能動

性，關注於媒介技術轉變的物質特徵，如何影響傳播活動的實踐與結構。例如電視媒介造成線性、視覺化的表現；印刷媒介讓冗長的爭辯、細讀深究的思考可能，這些例子都不是來自媒介物質結構對傳播活動產生的直接效果，而是媒介以不同方式中介後所產生的效果。

與前述兩種多少帶有媒介中心的立場，Couldry (2014) 認為藉由媒介化這個概念，研究者得以確認在所有社會過程中，媒介是無法被化約與忽視的面向，但問題是媒介如何作用於社會空間？為何媒介能對其他制度產生影響？Couldry 另闢蹊徑挪用 Bourdieu 的理論，賦予媒介具有產生象徵權力並影響行動者建構實體的能力，並以場域理論說明媒介跨越自身、擴及社會制度的效應。媒介化所指涉的媒介效應，以場域理論來說就是跨場域的效應 (cross-field effects)，這種跨場域的效應在 Bourdieu 對教會、國家乃至對新聞場域的分析中都可發現。Couldry (2003a, p. 667) 先以「媒介關連資本」(media-related capital) 描述媒介影響其他場域的能力，其次援引 Bourdieu 以「後設資本」(meta-capital) 定位國家權力場域影響其他場域間資本交換率的論點，主張「媒介關連資本」也是種能夠產生跨場域效應的「後設資本」。Couldry (2003b) 即藉此分析媒介儀式 (media ritual)，認為在媒介化社會中的象徵權力集中於制度化的大眾傳媒機構，媒介所持有的象徵權力影響閱聽人的詮釋框架與位置，透過媒介儀式不但賦予事件意義，主導性的敘述框架也獲得肯定、加強與維繫，而社會秩序也得以確認。

自 Lazarsfeld & Merton (1957) 主張最重要的媒介效果是由媒介機構所生的效應以來，學者即從不同的角度回應媒介效果由何而生的提問，「媒介化」概念也是回應此一經典問題的嘗試 (Couldry, 2008, p. 374)。儘管立論殊異，但持媒介化主張者的共同處在於認定媒介不但是社會文化活動的核心，更是社會文化變遷的行動者。若拉長時間向度，可以發現媒介日益涉入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建構日常生活、社會與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 Deacon & Stanyer (2014) 質疑，倘若媒介化重視的是媒介對制度與日常生活的影響，那麼與傳統效果研究又有何異？以形塑力指稱媒介化對社會文化產生影響，無疑又延續媒介中心的決定論；而論者皆聲稱媒介化是長時段的歷史過程，但這時間分段依不同立場又有十年、百年與千年之別，莫衷一是，孰是孰非？Deacon & Stanyer 認為，由於對概念定義的模糊，媒

介化理論是個缺乏區辨力的概念。

為了澄清媒介化概念，Jensen（2013）援引 H. Blumer 區分定義型概念（definitive concept）與觸發思考型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為之說明。定義型概念藉由明確定義指認現象中的共同性，觸發思考型概念則是給予研究者描述經驗世界的參考與指引。Hjarvard 與 Couldry 等人在媒介化理論內涵上雖有差異，但都以定義型概念為取徑，試圖定義何謂媒介化。其他將媒介化視為社會的結構化（social structuration）、技術動能（technical momentum）、鑲嵌式傳播（embedded communication）等論點，則被 Jensen 視為觸發思考型概念。觸發思考型概念並非因理論發展不夠完備而無法清楚界定現象與變項，而是因人所處的社會世界本會因情境而變化，概念理當隨生活世界的脈絡而改變。為有助媒介化理論的發展，研究者不妨以觸發思考型的策略概念化媒介化現象。

對媒介化理論的質疑，既和概念定義不清有關，也與媒介化理論缺乏實證經驗研究而備受挑戰，因此不少研究者呼籲發展更細微的歷史敏感性及採用明確的比較框架，分析社會的媒介化過程（Livingstone & Lunt, 2014, p. 707）。另一方面也如方念萱（2016，頁 73）所指出的：倘若將媒介化理論以觸發思考型概念定位，研究者仍必須指出媒介化觸發了什麼？要關注那些過去被忽略的「化」的過程與結果。Couldry & Hepp（2017, p. 34）即認為過往不同版本的媒介史敘述，多以單一媒介如何影響社會變遷著手，亦即當「新」媒介出現後，如何在社會文化上產生相對應的效果。但這種以媒介為基礎的敘述中，忽視由許多交互重疊的傳播活動所建構的社會世界。傳播在歷史中的角色不是像接力賽般地一棒接一棒，由某種具有影響力的媒介傳承到另一個更具影響力的媒介上。相反地，而是在媒介環境、行動者與社會世界彼此互動後的加乘積累後，創造出如今的媒介化世界。

在前一節的回顧中強調社區報的概念與實踐，和美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息息相關，特別是作為移民社會的美國如何達到社會整合。無論是早期的 Park，或推廣社區報研究的 Janowitz，關切的始終是媒介（報紙）如何滿足社區需求、如何達到社會整合的效果，後續研究也以實證資料確認社區媒介有助社會整合。媒介有助社會整合與發展的立論在現代化理論中更為顯著，特別是 Lerner（1958）主張：日益

增加的工業化將加深都市化的程度，高度的都市化將帶來識字率的成長，識字率的普及又將提昇人民對接觸媒體的頻率，接觸媒體的頻率愈高將有助人民在經濟與政治生活上的參與。其中測量接觸媒體頻率的根據，是每人平均所分配到的媒介數量（報刊、收音機、電影院）。在現代化等同進步的線性史觀中，媒介的角色無疑是促進社會發展的發動機。

在簡化的歷史敘事中，媒介與人、環境及與在地社會的互動明顯被忽略，媒介的「效果」也僅以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等指標為限，媒介如何形塑社區或如何促進社區的轉型也被研究者所忽略。倘若以社區／共同體的媒介化出發，可以發現社區／共同體的不同形式乃是媒介化的現象，以表 1 所羅列增補擴大的社區／共同體類型為例，無論是地理、興趣、實踐或解釋社區／共同體都可以超越地理限制的社區／共同體，這樣的現象在 ICTs 出現後日益普遍而受到關注。但這僅在技術與物質基礎上對媒介化的詮釋，還必須加入 Hepp 所言媒介的型塑力量，分析媒介建構社會文化的能動性，Anderson（1983／吳叡人譯，1999）將國族視為想像的共同體就是最顯著的例子。Anderson 強調方言書寫對建構國族的意義，說明以文字為媒介進行溝通帶來認同上的轉變；重視小說與報紙在建構國族認同、想像上的重要性，因為這是再現想像共同體的重要技術手段。就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是這樣的傳播空間才使想像性的國族意識成為可能，電子媒介隨後充實、強化國族建構。然而這種國族再現的媒介化不會是清楚明確的論述，而是平庸、日常的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習以為常、以世俗化方式獲得一致性的再現（Couldry & Hepp, 2017, p. 176），而這也正是媒介作為後設資本所產生的跨場域效應。

本文所探討 1970 年代的臺灣社區報，儘管所指涉的社區類型（都市郊區、農村社區等）各有不同，但無一例外都以地理空間為界分。如同前一節對美國社區新聞發展的回顧所指出的，社區報所以強調在地、直接的傳播，因為社區是可以透過感官而經驗到的社會關係，但這種經驗是對地方性的特殊概念。地方性是由人所控制，也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構成的概念，除了能夠以物質或物理性的面向界定，也必須根據社會文化而定義。換言之，社區／共同體是藉由文化與論述所構連而成的，無法化約成物質性，更甚者地方性的意義是由媒介所建構（Hepp, 2013, pp. 102-103）。因此，儘管傳統社區新聞以本質

化的方式訴諸在地性、鄰近性，但這些特質乃至社區報所訴諸涵蓋的社區，不但是媒介建構，更是媒介化的產物。

肆、臺灣的社區與社區報

前兩部分的回顧與整理，有助說明為何以媒介化理論詮釋早期臺灣社區報的發展歷程。社區、社區報是在美國獨特的地理與歷史發展經驗中形成的自發性實踐，以社區為核心的公共生活是具體而微、活生生地呈現在居民或讀者的日常生活。但對臺灣而言，無論社區或社區報，都是對外來移植的舶來品。臺灣在日治時期的地方基層行政組織始於 1897 年街庄社長的設置，其管轄範圍由縣知事或廳長規定。戰後，1946 年行政長官公署依照《臺灣接管計畫綱要》，頒布《臺灣省鄉鎮組織規程》，改街庄為鄉鎮，暫時沿用日治時期既有街庄之劃定（蔡慧玉，1996）。1947 年成立臺灣省政府，並於 1950 年頒布《臺灣省各縣市行政區域調整方案》，重新劃定臺灣省轄下之縣市，此時臺灣計有 5 個省轄市，16 個縣，368 個鄉鎮（臺灣省政府秘書處，1950，頁 890）。

儘管這些基層行政組織不必然和基於日常生活互動形成的社區概念衝突，但由於戒嚴時期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自由，當時人所經驗與認識的「社區」就是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基層行政組織，日後更導致因村里與社區劃分重疊而屢生衝突（林勝義，2016，頁 266）。另一個說明社區並非源自本土文化經驗的例子是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以來，在不少文獻與交流參訪觀摩活動中，經常聽見參與者以「做社區」描述所從事的工作（黃雅琪，2018）。在此不討論「做社區」豐富的實踐意涵與指涉，只是藉此說明倘若社區是既有的傳統與生活經驗，也就無需居民將社區「做」出來。

本文認為一方面社區以新穎的西方概念被引入臺灣，另一方面社區分辨彼此差異的地理性又是經由媒介而構連相關論述所形成的，此一過程不只是社區意義的擴大或改變，也是社區媒介化過程。由於媒介化過程強調媒介與社會制度之間的互動，正足以藉此分析前言所提社區過去半世紀並且持續至今的熱門關鍵字，媒介對社區認同究竟產生哪些影響？媒介如何以其後設資本的特殊地位發揮跨場域的影響？Hjarvard（2013）曾從制度特徵、主導邏輯、媒介體系及目的與對象

等面向，分析丹麥媒介的制度化發展。雖然兩地體制差異極大，但由於初期臺灣社區及社區報的發展皆由政府發動，且長期由國家主導其他社會制度的運作，加上 Hjarvard 的分析面向清楚易辨，為使研究聚焦，後文即參考 Hjarvard 的分析架構（表 2），分析臺灣社區報的發展歷程。

表 2：丹麥媒介的制度化發展

年代	制度特徵	主導邏輯	媒介體系	目的與對象
1920	媒介是其他制度的工具	受特殊利益引導	黨派報紙、科學期刊、宗教出版、藝術雜誌等	說服或聚焦於特定制度的特殊利益
1920-80	媒介是文化制度	公共指引	由公共廣電服務所壟斷、綜合性報紙	在公共領域表現社會共同利益
1980-迄今	媒介是半獨立制度並與其他制度整合	媒介專業主義、閱聽人／使用者的參與	商業、競爭媒介、衛星電視、網路、行動通訊、互動媒介	服務於閱聽人，在分化的媒介系統中銷售給目標群體

資料來源：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 (p. 26), by S. Hjarvard, 2013, London, UK: Routledge.

一、社區政策與社區報的萌芽，1965-1978

目前探討臺灣社區報發展歷史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將 1951 年姚朋發表於《報學》創刊號上的〈論鄉村報紙：反攻後我國報業努力的一個方向〉一文，視為提倡社區報的先聲。若仔細閱讀該文，可發現作者所以重視鄉村報，目的是為了反攻大陸後，必須從鄉村層次對人民進行思想改造、灌輸國家意識：

在反攻之後，報紙不能夠再侷限於「宣揚國策、傳達民意」為已足，而必須要從「宣傳利器」進一步而成為一種「教育工具」。共產黨的鼻祖列寧有言謂：「報紙不僅是宣傳者，而且是組織者」。共黨以黨員把持報紙，以報紙來操縱群眾。這是他們一貫的手法。而我們今後的作法則應該

是，通過報紙這一工具，讓知識份子能與群眾廣泛地結合，不是領導群眾，組織群眾，而是教育群眾（姚朋，1951，頁85）。

視報紙為宣傳工具的概念，同樣存在於二戰後受現代化理論影響的發展傳播論述中，只是重點將宣傳國家意識轉為宣傳現代化意識、發展現代化人格。

親身參與社區報工作的《台南一週》報社秘書長黃繼鋒（1998），將臺灣社區報的發展歷史分為：萌芽期（1965-1978）、發展期（1979-1987）、轉型期（1988-1997）。黃繼鋒的分期主要依據相關政策：1965年4月，行政院公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將「社區發展」列為重要社會政策；1979年7月行政院新聞局頒佈《輔導社區雜誌發展方案》，明文鼓勵社區報發展；1988年1月解除報禁。在《文山報導》創辦人之一何其慧（2006）的論文中，也接受這樣的時間分期，但將發展期延長至1999年，以1999年10月「中華民國社區雜誌協會」建置 *Comnews* 全國社區報網站作為網路期的起點。

這段期間主要有1965年世界新專《小世界》及1973年政大新聞系《柵美報導》，兩份由校內實習刊物轉型對外發行的社區報創刊。之後陸續有《今日美濃》（1974年7月16日至1974年9月3日）、《文山報導》（1975年8月2日至2014年1月17日）的創立。日後主導社區報政策的新聞局，在《中華民國73年出版年鑑》中，也將臺灣社區報的起源歸於世界新專發行的《小世界》。但「報紙的名稱未符合社區化，後來不得不走向學生實習的校內刊物。」（行政院新聞局，1984，頁73）為何僅以報紙名稱「未符合社區化」為由，認定《小世界》不再是社區報？畢竟在《小世界》發刊詞中可以看到，該報明確以服務學校所在「社區」為辦報理念：

它的所在地，是臺北市近郊，而屬於臺北縣的一個鄉鎮：木柵鄉。我們初步的期望，只是如何使它成為一份地方性的鄉村讀物，特別為本鄉和附近一些鄉鎮服務。（〈向讀者說明我們的旨趣〉，1965年1月2日）

在美國新聞界社區報的名稱頗繁雜，如：小城鎮報紙（small-town newspaper）、家鄉報紙（hometown newspaper）、鄉村週報（country weekly newspaper）等。但關鍵在「以地方為基礎的新聞內容，服務居住在明確地理空間上的人，對新聞以地方優先為新聞編輯處理準則。」（Lauterer, 2006, p. 1）。無論如何，從數量上來看這階段社區報在臺灣並未普及，本時期更大的意義應在於政府開始重視社區發展、引入社區概念。

論述臺灣社區發展政策起源時，研究者皆提及二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獨立，但各國隨即遭遇貧窮、疾病、髒亂、落後等問題。聯合國認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必須同時進行，於 1951 年通過議案，以工業國家「社區組織工作」（community organization work）中「社區福利中心」（community welfare center）的作法，做為推動戰後各國經濟社會建設的基本途徑。1960 年代初任職於聯合國，負責亞太地區各國社區發展訓練工作的張鴻鈞，多次返台鼓吹臺灣推動社區發展工作（林振春，1982，頁 97）。行政院遂於 1965 年 4 月公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將社區發展規定為我國社會福利措施七大方針之一，社區首次成為政府政策焦點。配合該項政策，行政院又於 1968 年公佈《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法務部，1968，頁 8）規定所需發展的社區為：

在市每一區選一貧苦落後區域劃為社區，在縣轄市、鎮每一市、鎮選一貧苦落後之區域劃為社區，在鄉村，每一鄉選一貧苦落後之村或鄰近之數村劃為社區。

很明顯地，《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中所界定的社區，是在既有行政區劃下經濟發展落後的鄉鎮村里。在同年稍後由臺灣省政府公布的《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中，對社區如何劃定有更清楚的規定：「以自然形勢及居民生活上之共同需要，為劃分之依據，一個村里得劃為二個社區，一個社區亦得包含二個以上村里，按住戶計，以三百五十戶為原則。」（臺灣省政府秘書處，1968，頁 3）依照這樣的標準將全省劃分為 4,893 個社區，預定八年完成全省社區基礎建設。八年計畫執行至 1972 年時，遭遇石油危機及推動十大建設造成的財務困難，檢討後改為《臺灣省社區發展十年計畫》（臺灣省政府秘書

處，1972），將計畫發展的社區數量減為 3,890 個社區，社區劃定方式仍舊與八年計畫相同。賴兩陽（2002，頁 72）評論早期社區發展政策時認為：

為了取得聯合國的支持，基於行政方便的考量，在原有村里組織的基礎上加上另一個社區組織，將全國快速計畫分為 4,893 個社區，這種社區劃定的方式，固可在短短的期間讓聯合國人員相信臺灣「非常重視」社區工作，而願意以經費加以補助，不過也埋下日後臺灣社區數量雖然龐大，但真正發揮功能的屈指可數，及村里與社區功能重疊，何者為重？牽扯不清的後遺症（賴兩陽，2002，頁 72）。

沿用基層行政組織而劃定社區的草率方式，與如今強調基於人文景觀、日常互動、由下而上自發參與的社區理念差距甚遠，也印證先前所述社區為西方舶來品的觀點。所謂社區，單憑政策執行者的主觀意願，以改善經濟狀況為目標，判定何地為社區。在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與十年計畫所推動的三大工作項目：基礎工程建設、生產福利建設、精神倫理建設中，前兩項明顯以工程建設為主，精神倫理建設雖偏重文化活動，但興建社區活動中心、社區公園、社區圖書室等硬體設施也在其中。

儘管這時期政府開始重視社區政策與社區的角色，但從政策的引進與執行，反映當時社區發展的基礎在現代化的經濟發展。社區只是作為現代化理論中謀求發展成長的基礎單位，社區自治、公民意識、審議問責不在考量中。自然而然地，理當作為社區公共論壇、反映社區意見的社區報，也不見於各類發展計畫。就媒介體系而言，臺灣當時處在戒嚴體制下所形成的侍從報業體制，不但興辦媒體並非易事，即使擁有媒體也必須時刻顧慮統治者的禁忌偏好，媒介實難發揮理想中在社區生活、民主社會中作為充分溝通互動的公共空間，無論大眾媒體或社區媒體都只是政治制度的傳聲筒，幾無自主空間可言。

二、社區報的發展期，1979-1987

任何分類、分期都是人為武斷的，雖然在 1965 年臺灣出現第一份社區報《小世界》，但真正促動臺灣社區報發展的應是 1973 年政

大新聞系實習刊物《大學新聞》改名為《柵美報導》，並從編採內容上轉向社區報發展。臺灣傳播研究於 1970 年代針對地方／社區報紙展開論述，並與政府推行的社區發展工作互相呼應，從農業社會學／新聞學的觀點，自美國引進草根報紙發展理論，批判當時大眾媒體「重都市輕城鄉」、「重北輕南」的偏頗，進而提倡小眾媒體，並提出社區報紙為提升社區文化的利器（孫秀蕙，1998，頁 6）。轉變背後是新一代傳播學者：徐佳士、潘家慶、陳世敏與楊孝滌等人，將現代化理論引進臺灣的影響。

涉獵過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關係書籍的學生們，都會被施蘭姆、倫勒、羅吉斯、麥克里蘭、羅氏、帕伊²等學者出版於 1960 年代的作品震懾不已。他們的著作無不證明：大眾傳播能協助國家發展。他們異曲同工的認為：識字是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初步，大眾傳播則是促進現代化的捷徑。倫勒甚至將社會的都市化、國民的識字能力、國民的媒介參與程度，國民的政治參與等四項指標視為「現代化」的基本條件（黃森松，1980 年 4 月 18 日）。

就讀政大新聞所，標榜「全亞洲第一家草根報紙」《今日美濃》的創辦人黃森松（1975），帶著大眾傳播如何促進國家發展的問題意識，以「社區報紙在鄉鎮中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作碩士論文主題，以實驗法於 1974 年 8 月 17 日至 9 月 3 日發行八期《今日美濃》，檢驗其研究假設。雖然《今日美濃》因研究結束暫告落幕，但隔年（1978 年 8 月 2 日）謝春波、何其慧夫婦創辦《文山報導》，黃森松則在退伍後於 1977 年 2 月 13 日在《今日美濃》的基礎上發行《美濃週刊》。2005 年卓越新聞獎第一屆社會公器獎得主：《山城週刊》，原已於 1978 年 3 月推出試刊號（盧蕙馨、楊嘉慶，1980 年 3 月 14 日），但適逢新聞局暫停受理雜誌申請登記一年，《山城週刊》待一年後新聞局宣布雜誌登記解禁，於 1979 年 7 月 15 日發行創刊號。

1979 年 3 月新聞局宣布雜誌登記解禁，7 月公布《行政院新聞局輔導社區雜誌要點》，創辦社區報風潮遍地而起，要點中明訂社區報的發展方向為：（1）反映溝通各方意見，作為政府與民眾間之橋樑；（2）聯絡民眾之情感，促進地方和諧；（3）激發社區意識，加

速地方建設；（4）公平、客觀報導，誠懇建言；（5）立場超然，不介入地方派系（黃繼鋒，1998，頁 186）。比起姚朋在 1951 年鼓吹反攻大陸後推行的鄉村報紙，至少新聞局替社區報設定的發展方向少了赤裸裸教育宣傳的角色，而是期待社區報能夠在不介入地方政治、不破壞團結和諧的前提下，以客觀中立的角色擔任官民間的溝通橋樑。

介入地方派系、從事地方政治，一直是從事社區報工作者時常面對的質疑。例如《美濃週刊》的黃森松就不斷面對：「讀者寫信給他，質問他『到底有什麼目的？』風言風語更多，許多人以為他辦報志在競選鎮長或議員。」（李師鄭，1980 年 4 月 21 日）因所在地新莊、泰山有眾多工廠，而開闢「工廠版」受在地勞工歡迎，訂戶一度有 5,000-6,000 份，於 1979 年 9 月創刊的《新泰豹》，因批評地方事務遭地方人士反擊而停辦。1979 年 5 月創刊，發行情有一萬兩千多份的《屏東週刊》，因報導縣議會新聞，遭 30 位縣議員聯名控告，「經過這番突如其來的糾擾，何美惠和鍾振昇更加肯定地方報紙不應有太過強烈的是非觀念，否則樹立太多反對者，對刊物的影響甚大。」（紀惠容，1984，頁 67）

在以臺灣電視政論節目探討政治媒介化的研究中，唐士哲（2014b，頁 31）認為：「一如『媒介化』概念強調，媒介的專業意識與獨立性格，往往促使政治機構或個人開始試圖遷就或配合，並且有意無意的內化媒介邏輯，甚而使其成為施政或政治過程考量的一部分。」就社區的媒介化過程而言，當社區居民透過社區媒介認同社區，從事社區公共事務者不但意識到社區媒介的監督功能，甚而思考如何迎合媒介邏輯而影響社區公共事務的抉擇時，應可說該社區出現媒介化過程。但從前引多位社區報經營者的敘述卻發現，涉及地方政治的公共事務反而是社區報的禁忌。如楊孝濂（1987）所言：

社區報紙之功能具有促進社區發展的特質，整合社區利益團體，促使社區在整體社區居民之認同和參與的型態。十分可惜的，在最近幾年來，在社區報紙之發展過程中之作用較少（楊孝濂，1987，頁 23）。

地方政治、派系與社區彼此糾結的問題，日後在社區總體營造時期依舊，印證論者批評社區與村里功能重疊、牽扯不清的實況。社區

報在地方政治上的困境，反映這時期的社區報對地方公共事務的影響有限，甚至必須保持距離以維持客觀中立的獨立身份，但這樣的獨立身份也是有問題的。1980年新聞局國內出版處成立「社區報紙輔導小組」，以每家新辦社區報補助15萬元鼓勵創辦社區報（彭家發，1986，頁25）。為何需要發展、補助社區報？依據時任新聞局國內出版處處長葉天行的說法：

尤其是報紙，每天只有三大張，除工商業廣告之外，可容納傳播媒體的篇幅有限。那麼「小眾」的意見何處表達呢？幾乎無處可表達。在這種情況之下，報導「小眾」關心的事，和表達「小眾」意見的媒體，是迫切需要的，社區報紙值得推廣（鐘麗慧，1980年4月22日）。

報禁不只限制報紙登記證數量，也限制每日最多出版三大張，這才是篇幅有限的主因，於是報社只能割捨地方新聞。加上限印措施規定報社只能在登記地印刷，加以當時相對落後的傳輸、編輯與印刷技術，也導致對地方新聞的忽視。這項措施實施後，共有28家社區報獲得補助（〈新聞局獎助設立社區報一片朝氣〉，1980年6月23日），但新聞局的補助引起政府介入的疑慮。原先新聞局長宋楚瑜邀請黃森松擔任「社區報紙輔導小組」的執行秘書，負責規劃推動社區報紙：

依據草根計畫，五百萬元將用來成立「草根雜誌發展中心」，協助有志創辦「草根報紙」的新聞科系學生，在鄉村創業……。草根計畫中決定，從今年起，五年之內，將分別在高屏地區、雲嘉南地區、中彰投地區、桃竹苗地區、宜花東地區各成立一個發展中心，協助各鄉鎮成立草根雜誌，五年將有一百家出現（黃森松，1979年8月15日）。

實際進行推動工作後，黃森松為抗議新聞局介入輔導不當，不但辭去執行秘書一職，更在1981年3月以停辦《美濃週刊》作為抗議（許瑞弘，2004，頁34）。³除了新聞局試圖以補助方式影響社區報的運作，由於多數社區報位處鄉村地區爭取廣告困難，加上發行範圍不若大報以及閱讀習慣難以改變，單靠訂戶數量不足以支撐。於是各

地鄉鎮公所或農會以訂閱社區報，免費贈與鄰里長或會員的方式達到補助的效果。雖然在公共媒體盛行的歐洲不乏以政府津貼補助媒體發展，但此時的政治環境顯然難以類比。但這並非指責社區報因而受控於政府，而是說明社區報難以透過上述方式在財務上取得獨立。

表 3：1984 年臺灣社區報發行狀況

社區報	發行區域	社區報	發行區域
柵美報導	臺北市木柵、景美	中壢週刊	桃園縣中壢、龍潭
文山報導	景美、木柵、深坑、石碇、新店、烏來、坪林	新泰豹雜誌	臺北縣新莊、泰山
美濃週刊	高雄縣美濃	淡水週刊	臺北縣淡水鎮
屏東週刊	屏東市及鄰近城鎮	雙和一週	臺北縣中和市、永和市
花蓮報導	花蓮、吉安、新城、秀林	今日臺東	臺東縣市
南投一週	南投全縣	臺中週刊	臺中市
鐵砧山週刊	臺中縣大甲、大安、外埔	高雄一週	高雄市
臨溪報導	臺北市士林區	臺南一週	臺南市縣
中港溪週刊	苗栗縣頭份、竹南、南庄、造橋	陽明報導	臺北市士林、北投
大路竹週刊	高雄縣路竹、湖內、茄萣	鹿港週刊	彰化縣鹿港
荖濃週刊	九如、里港、高樹、鹽埔（屏北）	新竹週刊	新竹市
桃園週刊	桃園、復興、八德、龜山、蘆竹、大園	板橋一週	臺北縣板橋
臺北一週	臺北市	臺中港週刊	臺中港鄰近鄉鎮
八卦山週刊	彰化縣八卦山地區	霧峰週刊	臺中縣霧峰
嘉義一週	嘉義市	中原週刊	苗栗縣
豐原一週	臺中縣豐原、潭子、神岡、后里	彰南一週	彰化縣南部、員林等地
海山週刊	臺北縣板橋、樹林、鶯歌、三峽	基隆一週	基隆市
山城週刊	臺中縣東勢、和平	城大龍一週	臺北市城中、大安、龍山區
北門區報導	臺南縣佳里、學甲、七股、將軍、西港	民生一週	臺北市民生社區
山林週刊	高雄縣阿蓮、田寮、岡山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73 年出版年鑑》（頁 73-74），行政院新聞局，1984，臺北市：中國出版公司。

在政府開放雜誌登記與實行輔導社區報政策後，的確掀起社區報的風潮。根據新聞局（1984，頁 74）《中華民國 73 年出版年鑑》的整理，1979 年是社區雜誌數量最多的時期，有 39 家社區報登記發行（表 3）。當中又可分為五種型態：（1）學校發行的社區報；（2）以農村社區為對象的社區報紙；（3）以都市郊區為對象的社區報紙；（4）以都市社區為對象的社區報紙；（5）以特殊商業地區為對象的社區報紙。《出版年鑑》中未清楚辨明各報屬何種型態，但透過《出版年鑑》中所記載各社區報的發行區域，亦即出版單位所設定想像的讀者與社區範圍，則呈現出與社區發展政策中所劃定社區的不同樣貌。

以生活圈為範圍：

柵美報導、臨溪報導、大路竹週刊、雙和一週、陽明報導、臺中港週刊、城大龍一週、民生一週。

以單一鄉鎮為範圍：

美濃週刊、屏東週刊、淡水週刊、鹿港週刊、板橋一週、霧峰週刊。

以單一縣市為範圍：

南投一週、臺北一週、嘉義一週、今日臺東、臺中週刊、高雄一週、臺南一週、新竹週刊、中原週刊、基隆一週。

以日治行政區為範圍：

文山報導／文山郡、花蓮報導／花蓮港廳、鐵砧山週刊／大甲郡、中港溪週刊／竹南郡、荖濃週刊／屏東郡、桃園週刊／桃園郡、八卦山週刊／彰化郡、豐原一週／豐原郡、海山週刊／海山郡、山城週刊／東勢郡、北門區報導／北門郡、山林週刊／岡山郡、中壠週刊／中壠郡、新泰豹雜誌／新莊郡、彰南一週／員林郡。

由於資料有限，上述歸類無法達到互斥且窮盡的原則，目的在呈現由於社區報完全由民間人士自主申辦，雖有政府補助，但仍必須考慮報業經營的現實，不大可能遵照社區發展政策中，以村里劃定社區

的方式做為社區報的發行範圍。於是在發行區域及讀者群的想像上所折射的思慮，反映出透過社區報所媒介化的社區。

回到本節開頭所提，1960年代透過現代化理論由聯合國倡導的社區發展被引入臺灣，由於執政者缺乏對社區的理解，僅著眼於爭取外援經費從事基層基礎建設，於是以既有的村里組織做為社區。加上執行過程中只重硬體建設，忽略創造公開互動討論的機制以獲致社區共識的過程，臺灣社會空有社區之名而無社區之實。但在這階段由於開放民間申辦社區報，因而不受控於官方僵化的行政規定，於是許多潛藏於居民心中的諸多不同社區想像，便透過社區報這個媒介顯露並實踐出來。如 Anderson（1983／吳叡人譯，1999）所言：

事實上，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括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像的。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非是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頁11）。

如果連傳統上被視為面對面直接互動的村落都是想像的產物，更何況現代社區？雖然這階段媒介仍舊作為政治制度的工具，僅能充當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橋樑，並且透過各種補助管控社區報的經營方向，限定在有限的議題上與其他社會制度產生互動。但藉由媒介所形塑出不同想像社區的方式，則呈現出社區的媒介化過程，也就是媒介技術不但重構行動者對社區與新聞的觀念，同樣也重構被傳統社區新聞視為根本性的接近性與地方性。

三、社區報的轉型期，1988-1999

社區報是否應接受政府補助、社區報在基層社會與政治中所應扮演的角色的爭論，並未持續太久，臺灣的出版與新聞市場就因快速的政變而改變討論焦點。1988年1月開放報紙登記，傳統大報及新設報紙，不再受制於必須於報紙登記地點印刷出版的規定，更無只能刊印三大張的規定，聯合報系、中時報系分別於台中、高雄設立印刷廠，加強地方新聞的報導與更快速的配送。加上往後幾年間，傳真與網路技術的引入，兩大報紛於中南部設置在地編輯中心，大幅報導在地新聞，如此種種都衝擊在人力、財力上不及高度資本化主流報紙的

社區報生存。1980年代開始蔓延的地下電台、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解嚴後開始嘗試自製地方新聞，也都影響社區報的發展。

在言論大開、百花齊放，社區報逐漸沒落的年代裡，另一股迥異於由國家主導社區政策的社區復興潮流，在底層社會蔓延茁壯。如莊雅仲（2014，頁 221）所言，1990年代臺灣逐漸走出戒嚴體制，「地方」成為熱門但有爭議的字眼，到 1990 年代末這股地方追尋的浪潮擴展至地方發展問題，「社區」成為發展問題的代名詞。首先是 1993 年總統李登輝提出「生命共同體」的主張，文建會於 1994 將之轉化為「社區總體營造」，成為可以實際操作的政策。在「社區總體營造」主事者陳其南（1992）的論述中，社區是建立民主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民主的實踐乃在於人民對日常生活公共事務的參與討論，並由此而凝聚出社區的共同意識。此外，社區也是個人認同的基礎，由此才能逐步提升為國家認同。畢竟社區才是生活中所能觸及、可辨識的社會實體單位。

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如何看待社區報／媒介？林福岳（1998，頁 158）引用《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手冊》中，關於「社區媒介」的章節，認為媒體之於社區總體營造或社區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的功能：

- 一、理念傳播：要傳播社區共同參與的價值觀，必須以媒體作為工具；
- 二、擴大活動的參與：為吸引成員參與社區活動，宣傳工作十分重要，而宣傳多半需仰賴媒體；
- 三、人與人的溝通：好的媒體有助於將社區中各項事務與議題，逐步形成共識。

從工作手冊中反映出的是這階段以社區總體營造為主導的社區工作，將媒介視為工具，視媒介為技術的媒介功能論：「文建會的構想及社區的實際做法，都是從社區文化的重建為切入點，以舉辦各類文化活動為手段。一旦談到傳播時，只剩下媒介的聯繫、教育、宣傳等實質功能，卻忽略傳播本身就是社區形成的要素及重要過程。」（林福岳，1998 年 6 月，頁 14）。同樣的觀點反覆出現在文建會關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相關出版品，例如在委託文化環境基金會（1999）出版的《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一書，就更強調媒介做為推廣社區營

造的重要宣傳工具。

當中的轉變與從何種層面切入社區營造有關，早期社區發展是由聯合國借鏡現代化理論於第三世界國家推動的發展策略工作，在這樣的脈絡下媒介被視為社區整合的重要機制而被重視。但到社區總體營造階段，強調的是以具體的文化活動而凝聚社區成共同體，媒介、傳播成為對外宣傳社造成果的工具。Williams (1976, p. 76) 認為 20 世紀出現社區政治 (community politics) 的用語，其意不止與國家政治 (national politics) 有別，更在於直接互動程度高，更能知曉社區內的政治權力過程，因此參與其中而使社區具有進步意義。杜威所言：「社會不只藉由傳遞、傳播而存在，公允地說，社會存在於傳遞、傳播之中」，也要在這樣的脈絡下掌握而不至於淪為對「大社群」(great community) 的懷舊想像。但這樣的觀點並未被當時社造工作者所體認，而將社區媒介窄化成工具。

也因此儘管社區總體營造由主管文化事務的文建會所推動，但對社區報、社區媒體的關注不若之前由新聞局主管並補助發展的階段。另一方面，社區忽視經營社區媒介的轉變也與媒體解禁有關。儘管創辦媒體不再受限，但所需的資本與人力對社區卻是龐大的負擔。1997 年文建會舉辦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研討會」中，與會的專業媒體人詹宏志建議社造人士在創辦社區媒介前，「要先深思，是否既有媒體真的達不到宣傳需求？虛榮和實際需求要分清楚，否則只是徒然消耗資源。」(于國華，1997 年 12 月 24 日)

顯然，資本問題比起前階段更嚴重，在中小功率廣播電台的開放上更明顯。由於廣播電台受限於發射機功率而影響其收聽範圍，中小功率電台本可因此缺陷，在缺乏商業廣告的吸引力下，朝向更具公共服務特性的社區電台發展(步明薇，1998)，但實際結果是中小功率電台業者透過跨區聯播形成全國廣播的事實。同樣地，1993 年公布的《有線電視廣播法》將臺灣區分為 51 個經營區，規定系統經營者必須設置地方頻道，本應可促進社區近用公共頻道。但當時的主要經營者：力霸與和信，以收購整併的方式形成兩大系統，於 1998 年前後分別在其臺北市所屬的系統台，推出《臺北 TV》與《臺北都會頻道》分庭抗禮。

由黃繼鋒、何其慧劃分的社區報發展階段，以 1999 年 10 月「中華民國社區雜誌協會」建置 *Comnews* 全國社區報網站作為發展期的

結束，之後進入網路期。但先是《行政院新聞局輔導社區雜誌要點》在 2003 年 1 月廢止，雖然新聞局歷年來的補助經費有限，但此舉無異於雪上加霜。2011 年黃森松恢復最早《今日美濃》的刊名，但轉型為美濃地方文史月刊；《文山報導》於 2014 年 1 月宣布停刊，《山城週刊》於 2018 年 12 月停止發行紙本轉為網路報。這些老社區報的轉型之路極為顛簸，也由於 1999 年 1 月《出版法》廢止，此後任何出版品不再需要申請登記，更難以查詢獲悉後續社區報發展。

但當 1999 年發生 921 震災，社區報再次受到重視。根據「全國民間災後重建協調監督聯盟」統計，1999 年 9 月至 2001 年 7 月，重建區先後存在八十多種社區刊物，至 2010 年時僅剩 3 家報刊定期發行（胡元輝，2016，頁 14）。2008 年莫拉克風災再度帶來重大損害，此時因網路與行動通訊的進展，造就出《莫拉克新聞網》的合作模式：

除了幾位專職記者的固定供稿外，透過遠端協力這種合作模式，南部旗美社大主任張正揚提供在地線索，北部輔大教授陳順孝帶領《生命力新聞》學生進行電話採訪，中部 921 重建工作者馮小非編輯上稿，建構獨立媒體跨區合作型態（何榮幸，2013 年 8 月 28 日）。

在制度論觀點出發的媒介化理論中，媒介被視為有其專屬運作規則並成為獨立的社會制度，以媒介邏輯探討媒介對社會制度的影響（Hjarvard, 2013; Mazzoleni & Schulz, 1999）。Strömbäck（2008）從四個面向分析政治媒介化的過程：（1）媒介在多大的程度上成為政治體系的資訊來源；（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政治體系；（3）媒介內容是由政治邏輯或媒介邏輯所控制；（4）政治行動者是依據政治邏輯或媒介邏輯行事。Strömbäck 繼而依據這四個面向，梳理出政治媒介化的四個發展階段。

當大眾媒介成為公民與政治機構間重要的資訊來源及溝通管道時，即進入政治媒介化的第一階段，在這階段中媒介機構與行動者的獨立性可能很低，例如存在著由政黨控制的報紙。在政治媒介化的第二階段時，媒介略具獨立地位，且能以媒介邏輯影響政治行動，例如以逐漸提升的新聞專業準則，或因為商業化程度日增而以更實用主義

的態度報紙政治事務。進入到第三階段的政治媒介化時，媒介的獨立地位與日俱增，促使政治行動者更需迎合媒介邏輯，這階段的特色是區分媒介世界與真實世界已無甚緊要，因為媒介化的實體其重要性已勝過真實實體。進入第四階段的媒介政治化時，政治行動者仍舊認為媒介是外在，但已承認必須適應媒介邏輯及新聞機構的新聞價值，更進一步地將其內化為行動準則。

依這四個發展階段檢視臺灣社區報發展歷程，正如 Strömbäck 在第一階段的媒介化中觀察到的，媒介機構獨立性低，且可能存在著由政黨控制的報紙。無論在社區報的萌芽期或發展期（1965-1978、1979-1987）階段，臺灣的社區報與其他媒介機構都無法視為獨立的社會制度，也明確存在受政府控制、影響的社區報。社區媒介不但高度依靠政治體系的補助，在訊息流通上也僅是充當傳遞政府欲發展現代化國家的理念，即便 1979 年實施《行政院新聞局輔導社區雜誌要點》，社區報依舊不脫由上而下，由政府而至民間的單向宣傳思維，因此在報導內容上無法展現自主的媒介邏輯更遑論影響其他社會機構。1988 年臺灣解除報禁後，媒介環境進入去管制的多元媒介體系，對新聞專業的獨立地位也逐漸接受並為其他社會制度承認。相對於主流媒介逐漸對政治制度發揮影響而步入媒介化的後續階段，臺灣的社區報／媒介並未如主流媒介般發揮顯著的影響，而是在發展社區在地認同上著墨，並成為宣傳社區營造成果的工具，無法漸次成為與地方社區組織、機構平起平坐的社區行動者。藉用 Hjarvard 分析丹麥媒介制度化的四個面向梳理臺灣社區報發展不同階段的特徵，可以更清楚看出社區報在臺灣發展的限制（表 4）。

表 4：臺灣社區報的制度化發展

年代	制度特徵	主導邏輯	媒介體系	目的與對象
1965-1978	社區報是政治制度的工具	現代化的發展邏輯	侍從報業體系	模糊
1979-1987	社區報是政治制度的工具	鞏固政治統治的政治邏輯	侍從報業體系	承上啟下的溝通橋樑
1988-1999	社區報是文化制度的工具	發展在地認同的文化邏輯	去管制的多元媒介體系	對外宣傳社造成果的工具

資料來源：本研究

但能否以此否定社區報在過去半世紀來的發展成果？對媒介化的社會建構論來說，由於強調媒介建構社會與文化實體的力量，媒介化因而指的是藉由傳播而建構社會文化實體的過程。因此側重媒介如何以新的方式塑造身份認同及日常生活，社會關係又如何地沈浸於媒介環境（Couldry & Hepp, 2013）。就此而言，在 1980 年代處與發展期的社區報由於不再受制於既有政策的束縛，而以各式各樣來自民間的社區想像創辦社區報，這些想像有基於生活圈、歷史傳統或者族群文化，都可以從社區報名稱、預設的讀者範圍一窺梗概，換言之這時的臺灣社區正經歷媒介化的過程。

在報禁解除後臺灣進入去管制的多元媒介體系，透過社區報引發的媒介化過程，反倒因技術、資本以及政策方向轉變而弱化社區報／媒介的重要性。Couldry（2003a）引入後設資本分析媒介是否產生跨場域的效應並未在社區報上出現，而是國家權力場域及經濟場域持續影響媒介。社區的媒介化過程因而停止嗎？2000 年前後，另一種建構地方社區的概念開始浮現，先是政治人物喊出「309 鄉鎮走透透」的競選口號，隨後 2001 年《天下雜誌》推出「319 鄉向前行」特刊，此後演變為《微笑 319》、《微笑臺灣》等出版品與網站。乃至 2006 年紙風車兒童劇團開啟「319 鄉鎮兒童藝術工程」巡演活動。⁴「319 鄉鎮」成為媒體論述、想像臺灣地方社會簡潔有力的數字。但這已與此前由社區自發的過程截然不同，對社區認同、再現乃至社區媒介的發展仍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伍、結語：無所在的社區

媒介化過程即傳播活動如何以特定的媒介過程建構實體，而媒介的特殊性質又如何對傳播過程產生脈絡化的效果。為論證媒介化為普遍、長時段的後設過程，Couldry & Hepp（2013）以機械化、電子化、數位化、數據化（mechanization, electrification, digitalization, datafication）區分媒介化的不同階段，說明人類歷史在不同媒介環境下的性質特徵，以及這些媒介又如何建構社會世界。參考 Jankowski（2002）的觀點：任何時代出現的新媒介，都曾使不同年代的研究者期待此一新媒介有助於社區／共同體新生，則可將媒介與社區的媒介化歷程描述為如下：機械化浪潮下的媒介化，藉由印刷資本主義而使

以國族主義為核心的想像共同體得以實現；電子化浪潮的媒介化，藉由遠端通訊、衛星技術創造出麥克魯漢預言的全球村；數位化浪潮則讓「無需任何所在」的虛擬社群浮現。

Jankowski (2002) 強調無論媒介技術為何，對社區／共同體的渴望始終如一，人總是試圖利用不同的媒介，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創造社區／共同體，重振連結。Couldry & Hepp (2013) 也提醒研究者不只關切構成媒介化浪潮中顯著的斷裂，更要注意在不同媒介化浪潮下所衍生相異的社會互動與傳播型態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 下，行動者是如何建構出有意義的社會實體。在臺灣社區報／媒介的發展中可以看到，從事社區報／媒介人士所心繫的是如何以媒介重構社區認同，保存社區文化。在 1979 年推行《輔導社區雜誌要點》及 1990 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有志社區報／媒介人士不再受限於行政區劃的限制，以機械化浪潮下的紙本印刷媒介，建構符合其日常生活經驗與歷史文化記憶想像的媒介化社區。

儘管電子化浪潮下的諸多技術早已存在於民間（無線電通訊、社區共同天線等），但並未被運用於社區傳播上。雖然 1990 年代的開放天空政策，使民間人士得以合法申辦使用不同的電子傳播技術，但 1990 年代的社造人士並未以電子媒介作為串連改造社區文化的媒介，多數仍沿用紙本印刷媒介溝通社區事務。雖然 Couldry & Hepp (2013) 以機械化、電子化、數位化、數據化陳述媒介化進程，但也強調這過程並非一棒接一棒地交替傳承，而是在不同因素的互動影響下，形塑出不同的媒介環境與媒介文化。近期 Strömbäck & Esser (2014) 為避免過度單一化、總體化的聲稱，修正媒介邏輯實乃由專業、商業與技術等不同邏輯所交織的混合性邏輯。媒介化的進展並非由單一媒介所決定，進化或遲滯也非評斷的標準，而必須從不同媒介對構築社區／共同體的影響上觀察。

例如在胡元輝 (2016, 頁 6) 主編的《在地翻轉：臺灣社區媒體新浪潮》書中，「以具有代表性的個案，展示臺灣社區媒體的多元面貌。」匯集 16 個近年受矚目的新興社區媒體。當中僅有 2 個社區媒介（《大埔里新聞網》、《宜蘭新聞網》）是純粹網路出版，其餘 14 個社區媒介儘管出刊時間不定，也以不同的網路平台更新訊息，但紙本刊物仍是經營重心所在。因此胡元輝 (2016, 頁 15) 認為：「從各種資料與訪談顯示，此一發展與科技創新無重大關連，卻與本土社運

的發展、社區營造的政策、社區大學的推動、青年返鄉的投入及公民新聞的鼓吹有關。」

這些「文青風」的地方誌：基隆《雞籠霧雨》、淡水《淡淡》、三峽《Shock 三峽克》、桃園《夭夭》、新竹《貢丸湯》、《風起》、臺中《溫度》、嘉義《漫漫刊》、臺南《正興聞》、高雄《什貨生活》、《藍寶石》、花蓮《拾紙》、屏東《撫浪屏東》等。部分已經停刊，部分仍持續發行，不但刊期不一，有些更已非雜誌而是書籍小冊（小誌，Zine）。除了編輯形式、內容文風與過往社區報不同，更特別的是在自媒體、社群媒體進入門檻極低的狀況下，仍投入紙本社區報／刊物的經營。

影山裕樹（2016／林詠純譯，2018，頁 6-7）介紹日本地方刊物時指出，日本地方的獨立刊物或免費報紙，是為了連結興趣相投的人而製作的刊物，凸顯刊物如何在地方串起人與人連結的特點。因而地方刊物真正的價值，體現在製作過程的豐富度而非成品本身。因此地方刊物如何做為街坊鄰居間的聯絡版、如何成為地方經濟的一環、如何回應地方課題的工具，成為地方刊物（社區媒介）存續的關鍵。問題不在媒介，而是如何型構出對社區在地居民有意義的媒介化社區。

Howley（2005, p. 33）強調必須將社區媒體擺放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分析，因為社區媒體有著強烈的慾望去堅持在地自主性，及在跨國媒體及隨之而來的文化同質化下的艱困情勢中捍衛獨有的在地文化認同。社區媒體能夠證明經濟邏輯與文化全球化不盡然是普世化的共通價值，也不像某些批評者所言是總體化的。毋寧社區媒體是在地與全球化行動者、勢力與條件互相滲透的場域。這樣的觀點與實踐，當然不同於臺灣 1970 年代以現代化理論為主導的社區發展政策，也不同於 1990 年代帶有懷舊色彩、打造新故鄉、建立新國族認同的社區總體營造。因此儘管紙本媒體的沒落已成趨勢，網路串連的社群更可輕易超越地理空間的限制，但作為直接互動而來的親身體驗與社區公共生活仍舊重要，必須放棄媒介做為工具的侷限而從社區本身思考如何形成有意義的傳播。

註釋

- 1 戒嚴時期人民無辦報自由，有心經營「社區報」者僅能以雜誌名義登記申請。依據《出版法》第一條規定：「雜誌：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按期發行者而言。」但根據內政部多次回覆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的電文又規定：「雜誌名稱禁用『報』『新聞』『快訊』或『通訊』字樣」（臺灣省新聞處，1983，頁 19）。因此即便就名稱而言，也不存在社區報。但從 1970 年代以來學界、主流媒體即以「社區報」稱呼這些小報版型、週刊形式、紮根地方，服務小眾的社區媒體。本文沿用這種約定俗成的使用方式，後續行文以社區報稱呼此類社區雜誌。
- 2 分別是：W. Schramm, D. Lerner, E. M. Rogers, D. C. McClelland, P. Roy, L. Pye。
- 3 《美濃週刊》在 1981 年 3 月停刊後，新聞局非常惋惜，曾多次奔走美濃與地方上的文人、新聞從業人員溝通，終於在 1982 年 3 月重辦了一份以美濃最高山為名的《月光山雜誌》（紀惠容，1984，頁 68）。
- 4 「309 鄉鎮」指原臺灣省政府所管轄的鄉鎮數目，「319 鄉鎮」則是加入金門、馬祖 10 個鄉鎮。2011 年紙風車劇團完成第一次巡演後，配合行政區改制將活動名稱改為「368 鄉鎮市區兒童藝術工程」。

參考書目

- 〈向讀者說明我們的旨趣〉（1965年1月2日）。《小世界》，1版。
- 〈新聞局獎助設立 社區報一片朝氣〉（1980年6月23日）。《民生報》，7版。
- 于國華（1997年12月24日）。〈全傳播時代自創社區媒體 專家說不能只靠熱情行事〉，《民生報》，19版。
- 文化環境基金會（1999）。《臺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軌跡》。臺北：行政院文建會。
- 方念萱（2016）。〈媒介化、行動化：媒介化理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對話〉，《傳播、文化與政治》，4：55-83。
- 行政院新聞局（1984）。《中華民國 73 年出版年鑑》。臺北：中國出版公司。
- 何其慧（2006）。《社區報讀者閱報習慣與社區意識關聯性之研究：以文山報導為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何榮幸（2013年8月28日）。〈感謝你，莫拉克新聞網〉，《獨立評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3/article/567>
- 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原書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UK: Verso.）
- 李師鄭（1980年4月21日）。〈一個為理想奮鬥的鄉下人〉，《民生報》，7版。
- 步明薇（1998）。〈社區媒介與參與：以參與傳播架構對小功率社區電台所行之評估〉，林靜伶編《1998 傳播論文選集》，頁 301-383。臺北：中華傳播學會。
- 林振春（1982）。〈我國社區發展與基層建設之比較〉，《社區發展季刊》，18：37-48。
- 林勝義（2016）。〈透過社區發展推動社會福利：臺灣與英國經驗之比較〉，《社區發展季刊》，154：257-270。
- 林詠純譯（2018）。《進擊的日本地方刊物》。臺北市：行人。（原書 影山裕樹 [2016] ローカルメディアのつくりかた：人と地

- 域をつなぐ編集・デザイン・流通。日本京都：学芸。）
- 林福岳（1998）。〈社區媒介定位的再思考：從社區媒介的社區認同功能論談起〉，《新聞學研究》，56：155-173。
- 林福岳（1998年6月）。〈論社區傳播概念之建構：從社區總體營造的文化觀點談起〉，「1998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臺北縣深坑。
- 法務部（1968）。〈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司法專刊》，207：8-11。
- 姚朋（1951）。〈論鄉村報紙：反攻後我國報業努力的一個方向〉，《報學》，1(1)：85-89。
- 紀惠容（1984）。〈走馬全省看社區報〉，《時報雜誌》，264：60-69。
- 胡元輝（2016）。〈從草根出發讓溝通民主：臺灣社區媒體新浪潮的形成與挑戰〉，胡元輝（編）《在地翻轉：臺灣社區媒體新浪潮》，頁 7-30。臺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 唐士哲（2014a）。〈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新聞學研究》，121：1-39。
- 唐士哲（2014b）。〈從政治化媒介到媒介化政治：電視政論節目作為制度化的政治實踐〉，《中華傳播學刊》，25：3-41。
- 孫秀蕙（1998）。〈大眾傳播與社區意識：社區公眾特質初探〉，陳世敏編《傳播論文選集 1997》，頁 1-37。臺北：中華傳播學會。
- 莊雅仲（2014）。《民主臺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學。
- 許瑞弘（2004）。《社區報紙的社區公共事務功能：以《今日美濃》與美濃菸農自救運動為實例的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其南（1992）。《公民國家意識與臺灣政治發展》。臺北：允晨。
- 彭家發（1986）。《小型報刊實務》。臺北：三民。
- 黃森松（1975）。《鄉村社區報紙與鄉村社區發展：兼論小眾媒介能否在台灣鄉間生存》。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森松（1979年8月15日）。〈再見，家鄉〉，《美濃週刊》，99，1。

- 黃森松（1980年4月18日）。〈從「美濃實驗」展望社區報紙的蓬勃興起〉，《民生報》，7版。
- 黃雅琪（2018）。《「做社區」與公共性：以埔里牛眠社區發展個案為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繼鋒（1998）。〈社區雜誌與社區發展〉，臺灣省政府文化處編《中日社區總體營造與鄉土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183-198。南投縣：臺灣省政府文化處。
- 楊孝滌（1987）。〈社區報紙在社區中之整合功能〉，《社區發展季刊》，38：22-23。
- 臺灣省政府秘書處（1950）。〈臺灣省各縣市行政區域調整方案〉，《臺灣省政府公報》，秋66：890-892。
- 臺灣省政府秘書處（1968）。〈臺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臺灣省政府公報》，冬1：2-10。
- 臺灣省政府秘書處（1972）。〈臺灣省社區發展十年計畫〉，《臺灣省政府公報》，夏51：2-11。
- 臺灣省新聞處（1983）。《新聞業務手冊》。臺中市：臺灣省新聞處。
- 蔡博方（2013）。〈教育家或研究者？公民或記者？反思 James W. Carey 的知識貢獻〉，《傳播研究與實踐》，3(2)：141-158。
- 蔡慧玉（1996）。〈日治臺灣街庄行政（1920-1945）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臺灣史研究》，3(2)：93-141。
- 鄭義愷譯（2009）。《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臺北：群學。（原書 Appadurai, A. [1995].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盧蕙馨、楊嘉慶（1980年3月14日）。〈吳鎮坤不聽勸阻硬要辦報 山城週刊在東勢闖出名號〉，《民生報》，7版。
- 賴兩陽（2002）。〈臺灣社區工作的歷史發展與功能轉型〉，《社區發展季刊》，100：69-80。
- 謝志誠（2019年8月25日）。〈懷著敬畏與不捨的心情彙整這些即將流失的資料與記憶〉，《謝志誠的觀察與學習》。取自 <https://jcsieh.tw/?p=7288>

- 鐘麗慧 (1980 年 4 月 22 日)。〈鼓勵年輕人回鄉辦社區報紙 新聞局給予精神與物質協助〉，《聯合報》，1 版。
- 顧忠華譯 (1993)。《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臺北：遠流。(原書 Weber, M. [1968]. Basic sociological terms. In G. Roth & C. Wittich (Eds.),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 2, pp. 3-62). New York, NY: Bedminster Press.)
- Altheide, D. L., & Snow, R. P. (1991). *Media worlds in the postjournalism era*.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 Bailey, I. G., Cammaerts, B., & Carpentier, N. (2007).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media*. Berkshire, UK: McGraw Hill.
- Couldry, N. (2003a). Media meta-capital: Extending the range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32, 653-677.
- Couldry, N. (2003b).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London, UK: Routledge.
- Couldry, N. (2008).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10(3), 373-391.
- Couldry, N. (2014). When mediatization hits the ground. In A. Hepp & F. Krotz (Eds.), *Mediatized world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 media age* (pp. 54-71). New York, NY: Palgrave.
- Couldry, N., & Hepp, A. (2013).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3(3), 191-202.
- Couldry, N., & Hepp, A. (2017).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UK: Polity.
- Culver, K. B. (2014). Advocacy and infrastructure: Community newspaper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needs. *Journalism Practice*, 8(2), 137-148.
- Deacon, D., & Stanyer, J. (2014). Mediatization: Key concept or conceptual bandwag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7), 1032-1044.
- Dewey, J. (1991).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then, OH: Swallow Press.
- Dewey, J. (2004).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Dehli, IN: Aakar Book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tcher, J. A. (2012). A view from outside: What other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can teach us about community journalism. In B. Reader & J. A. Hatcher (Eds.), *Foundations of community journalism* (pp. 129-

- 149). Los Angeles, CA: Sage.
- Hepp, A. (2009). Differentiation: Mediat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 consequences* (pp. 135-154).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Hepp, A. (2013). *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 Hepp, A., & Krotz, F. (2014). Mediatized worlds: Understanding everyday mediatization. In A. Hepp & F. Krotz (Eds.), *Mediatized world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 media age* (pp. 1-15). New York, NY: Palgrave.
- Hepp, A., Berg, M., & Roitsch, C. (2014). Mediatized worlds of communitization: Young people as localists, centrists, multi-localists and pluralists. In A. Hepp & F. Krotz (Eds.), *Mediatized world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 media age* (pp. 174-203). New York, NY: Palgrave.
- Hepp, A., Hjarvard, S., & Lundby, K. (2015). Mediatization: Theor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7(2), 314-324.
- Hess, K., & Waller, L. (2014). Geo-social journalism: Reorienting the study of small commercial newspapers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Journalism Practice*, 8(2), 121-136.
- Hjarvard, S. (2013). *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Routledge.
- Hjarvard, S. (2014). From mediation to mediatizati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ew media. In A. Hepp & F. Krotz (Eds.), *Mediatized world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 media age* (pp. 123-139). New York, NY: Palgrave.
- Howley, K. (2005). *Community media: People, place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nkowski, N. W. (2002). Creating community with media: History, theories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In L. Liverouw & S. Liv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 (pp. 34-49). Los Angeles, CA: Sage.
- Janowitz, M. (1951). The imagery of the urban communit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5(3), 519-531.
- Jensen, K. B. (2013). Definitive and sensitiz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mediat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3(3), 203-222.
- Krotz F. (2009). Mediatization: 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etal change.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

- consequences* (pp. 21-40).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Krotz, F. (2014). Media, mediatization and mediatized worlds: A discussion of the basic concept. In A. Hepp & F. Krotz (Eds.), *Mediatized world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 media age* (pp. 72-87). New York, NY: Palgrave.
- Lauterer, J. (2006). *Community journalism: Relentlessly local*.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Lazarsfeld, P. F., & Merton, R. K. (1957).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B. Rosenberg & D. M. White (Eds.), *Mass culture: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pp. 457-473).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Lerner, 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Livingstone, S., & Lunt, P. (2014). Mediatization: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Handbook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Vol. 21, pp. 703-723). Berlin, DE: De Gruyter Mouton.
- Lundby, K. (2009). Introduction: 'Mediatization' as key.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 consequences* (pp. 1-18).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Lundby, K. (2014).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Vol. 21, pp. 3-38). Berlin, DE: De Gruyter Mouton.
- Lunt, P., & Livingstone, S. (2016). Is 'mediatization' the new paradigm for our field? A commentary on Deacon and Stanyer (2014, 2015) and Hepp, Hjarvard and Lundby (2015).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8(3), 462-470.
- Mazzoleni, G., & Schulz, W. (1999).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247-261.
- Mersey, R. D. (2009). Online news users' sense of community: Is geography dead? *Journalism Practice*, 3(3), 347-360.
- Park, R. (1922).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New York, NY: Harper & Brothers.
-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 Robinson, S. (2014). Introduction: Community journalism midst media revolu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8(2), 113-120.

- Strömbäck, J. (2008).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3(3), 228-246.
- Strömbäck, J., & Esser, F. (2014). Introduction. *Journalism Studies*, 15(3), 243-255.
-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 Tönnies, F. (1963). *Community and society*. London, UK: Harper & Row.
-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London, UK: Fontana Press.

Mediatized Communities: Exploring Taiwan's Community Newspapers by Mediatization Theory

Shun-Shing Huang*

Abstract

“Community” has been a keyword in the Taiw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since the 1990s.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the 921 Jiji earthquake, and even the revitaliz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Taiwan's community media once thrived and played a role in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ng community identity. However, unsustainable policies and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continue to pose challenges to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community media. This article uses mediatization theory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community newspapers, analyze the structural factors behind their rise and fall, and consider how community newspapers can shape the vague and changeable concept of community and create a unique media culture.

Keywords: community newspapers, community media, mediatization, mediatized communities, journalism history

* Shun-Shing Huang i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